

论乔纳森·休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辩护

胡云皓

摘 要: 作为当代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 乔纳森·休斯坚决反对西方绿色批评者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指责, 力图证明该理论与对环境问题及其制约因素的理解是相互兼容的。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在人与自然因果关系的理解框架中, 阐明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的普遍性和生态依赖性; 坚持政治经济学主要观点, 在生产力、技术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研究中, 论证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效应需要以生态良性的形式来实现; 遵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 在需要三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中, 展现马克思以生态制约、生产发展和需要丰富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种辩护虽然存在抛弃辩证法、缺乏政治导向、轻视生产关系、夸大需要作用等理论缺憾, 但仍然从思维方式、生产方式、技术创新和消费方式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绿色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休斯; 生产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1.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2)04-0001-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04.007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生态思想, 生产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否持有生态保护立场, 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和按需分配原则是否违背自然规律、突破环境承载限度, 成为西方绿色批评者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时常争论的重要话题。概括地说, 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批判, 全面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哲学层面怀疑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过于强调改造与生产的特征, 不具备哲学普遍意义, 也忽视了劳动对生态条件的依赖性;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曲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技术辩证关系的思想, 认为环境破坏是技术生产力的根本性质, 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学说层面抵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按需分配原则, 认为需要的无限增长及其生产活动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限度而破坏生态平衡。在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休斯主要通过对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观念的定性解释来捍卫其生态立场; 同时, 他试图论证马克思关于人类依赖自然并受其影响的解释方式, 能够为现代社会研究生态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框架。

一、历史唯物主义: 在自然界中定义劳动过程

在哲学层面, 泰德·本顿等人怀疑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能清晰地阐明劳动过程依赖生态因素的完整程度。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鲜明坚持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以及人的生态依赖原则, 但是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经济理论当中, 因而存在“生态思想断裂”。劳动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21BKS053);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生态向度”(581122501421)

作者简介: 胡云皓,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hyh137815@163.com (北京 100872)

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本顿的第一个典型论断是,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内含有改造自然的“意向的结构”,其“改造性”和“生产性”不能涵盖所有的劳动过程,从而限制了概念自身的普遍性。其他劳动即他称之为“生态控制”和“主要占用”的劳动,具有特别依赖于环境条件的特征。因此,马克思的概念只能有限地解释经济学意义上的改造性生产,而不能阐明劳动过程的哲学共性。第二个论断是劳动过程具有很强的生态约束性和依赖性,却被马克思的基本概念排除在外。农业劳动的内容是培育和管理,特别要遵循自然生长规律,是一种“生态控制”劳动;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一种保持和占有状态,是一种“主要占用”劳动。这些劳动同马克思所指代的改造性生产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被他不加解释地强行收纳到了自己的理论当中。这就夸大了劳动的改造性,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劳动工具的物质形态和生态环境的物质承载力等生产的自然条件置于自身之外,不能合理地阐明劳动过程的普遍性和生态依赖性,最终劳动内含的主体意向也难以贯彻到底。因此,马克思描述劳动过程的关键概念“包含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冲突、不准确和间隙,使其概念化不足以充分说明人类为满足需要而同自然进行互动的生态条件以及相应约束”^[1]。

在休斯看来,对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整个生产力理论实质的解读。本顿等人的错误在于,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兼具哲学与经济学意义,因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从自然界中定义劳动过程的一般概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休斯阐述了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在解释和规范方面的普遍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永恒依赖性。

其一,只有将劳动过程放到人与自然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妥善地理解其生态向度。尽管许多环保主义者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有复杂交互的因果关系模式,但他们倾向于强调生态依赖,而轻视人类改善自然条件的努力。他们经常假定主张控制自然的思想家们一定低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依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一些环保著作中看似合理地地质疑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潜力。但是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等思想家们追求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可能不仅是因为意识到生态依赖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而且正是为了降低这种依赖的不良后果而强调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其二,休斯将人与自然的双向关系细分为生态依赖、生态影响和生态包含等相互关联的原则,力图更好地将这种关系应用到对马克思观点的考察中。一是生态依赖原则,即人的生存和发展始终依赖自然界,并受到他们所面临的自然特征的影响;二是生态影响原则,即人的行为无论是否存在意向,总会影响自然。为了更清晰地阐明马克思著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依赖原则,休斯补充性地增加了生态包含原则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影响当然是双向的,但人对自然的依赖是单向度的永恒的事情,因而生态依赖原则居于更核心的解释地位。休斯引用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的观点,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对自然优于思维的认可,必须承认非人类的自然的独立力量;他也同意彼得·狄更斯的见解,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为克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离提供了理论出发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人类和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即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进程中也改变自己,并论述了社会制度和社会进程调节这种关系的方式。其三,生态依赖原则始终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劳动过程始终是社会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形式。休斯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自然其余部分的论述^①,最为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将历史科学作为研究人的身体特性及其周围环境学科的延伸。由于

^① 这里是指休斯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典语录:“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工作任务是澄清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观念，没有将自然界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但他们承认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态依赖对于合理认识人类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他们指出劳动是人类历史基本的和不断发展的永恒条件^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一般物质特征的角度把生产过程描述为劳动过程，指出它“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2](P215)}。这里显然表明，满足人类需要是劳动过程的目的，对非人类自然物的占有是必要条件，所以马克思关于劳动具有永恒必然性的观点，暗示了生态依赖原则的永恒性。此外，休斯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中的语录^②，更加清晰地表明马克思肯定人类对劳动过程的永恒依赖以及生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由于了解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一般抽象，休斯觉得本顿的第一个论断有些莫名其妙。他表示，“生态控制”和“主要占用”劳动完全可以被马克思的概念框架所吸收。第一，本顿关于生态控制的劳动不是主要应用于原料的看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各种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是直接应用在原料而是应用于生产资料或环境条件如建筑与基础设施等，是很平常的事情；这里的劳动也可以指向保持而不是改变。第二，工业劳动虽然不如农业劳动那般非常依赖环境和气候条件，但在时间安排和地点选择上依然要受到生态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以加工自然资源为主的工业更是必须优先考虑原料产地的距离。第三，马克思辩证地看待劳动过程三个要素的分类和应用，强调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源，又充当原料”^{[2](P213)}。显然，“生态控制”和“主要占用”是所有劳动在不同程度拥有的特征，已经隐含在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中。如果继续追究各种类型的劳动过程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那么对于一个总括性概念来说未免过于苛刻。即使概念描述的各对象之间会有极大差异，也没有必要在概念本身里进行说明，因为概念关注的是事物的抽象共性，而不可能一应俱全地描述各类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况且马克思从来没有宣称，他的劳动过程概念以简单抽象的要素实现了对全部劳动类型的各种特征和所有目的的细致描绘。

在休斯看来，本顿第二个批判性论断表明他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一方面，本顿要求独立阐明劳动过程的自然条件，这当然值得肯定，但马克思已经做过相应区分，不存在所谓生态空场。这种自然条件实际上是马克思在更广泛意义上所说的劳动资料，即不作为活动传导但仍然是劳动过程所需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本顿主张必须承认生产的自然条件可能不再被满足以及这种可能性对生产的长远影响，但马克思不仅没有排除这一情况，而且通过大量篇幅表明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将人口聚集在城市中心的做法已经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天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使人以衣食住行等生活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难以回归，导致土地肥力不断下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人类对自然的胜利起初确实获得成果，但往后可能遭致自然报复。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承认人类生产的自然条件可能不再被

① 这里是指休斯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典语录：“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② 这里是指休斯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经典语录：“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

满足，而且推论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源自生产的无意识后果，如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匮乏，生态后果不被行为主体所预见或者不在主体考虑范围内等等。

总而言之，休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人与自然因果关系的理解框架中，阐述了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在解释和规范方面的普遍性及其对生态环境依赖的永恒性。在他看来，要使马克思著作中含有的生态学论点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现，可以对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细微的调整而不失其原意。

二、辩证发展观：技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选择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莱内尔·格伦德曼等人批判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理论具有反生态性。生产力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一直是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许多研究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视为技术决定论或唯生产力论，将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新技术的发展，而不考虑生产关系问题。在格伦德曼看来，当今科技发展早已远远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程度，马克思极力强调发展生产力和技术的主张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因为现代生产力发展隐含着破坏环境的要素。首先，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蔓延和加剧。自人开始使用技术发展生产力以来，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和频度就呈现逐步增加趋势。到了现代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技术已经推进到极高水平。虽然技术应用可以在改善环境危机或减缓危机蔓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这种生态改善效应远不能抵消生态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其次，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科学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相关技术的关联性，使得它们比以往单一技术更容易对生态安全造成严重风险。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已经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多领域，从而客观上确实提高了环境危害事故的发生概率。另一面，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强专业壁垒以及生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高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察觉到自身生产行为所造成的潜在或较为长远的自然后果。社会生产“在正常运行中更容易造成环境破坏，无论采取什么安全措施，如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博帕尔等事故都在所难免”^{[3](P33)}。最后，瓦尔·罗特莉和科恩等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自动化蓝图是反生态的，因为它必定以远超以往各时代的能源资源消耗为发展成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允许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超越生态系统循环界限的原料和能源，最终导致自然要素流转失衡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现代生产力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应用消耗更多能源资源的高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实际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增添更多劳动力以促进社会生产，从而深陷异化劳动的漩涡，难以合乎人性地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使人不能充分享受自由劳动和闲暇时间。因此，破坏环境是某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根本性质，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取决于社会结构特别是马克思强调的财产关系的变革，而是取决于人类对科技发展掌控的可能性。

在休斯看来，抽象地讨论人对自然的改造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生态辩护的中心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论点。绿色批评者的失误在于只是看到生产力发展的定量维度，而忽视其定性维度的解读。休斯通过考察生产力与技术的辩证包含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分离式结构，论证马克思将有可能选择技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形式作为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

首先，休斯较为详细地辨别了生产力与技术的密切关系，批判了那些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技术元素在生产力中的突出地位和影响生态问题的关键效用，休斯提出了“技术生产力”的观点。他认为，一切技术的发展都必须包含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即人与物。从广义上看，技术不仅包括工具和机器即生产资料，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应包括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发现、提取和应用技术，从而涉及生产力的原料组成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技术是生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即使在最宽泛的描述中，技术仍然是生产力的一个

部分或元素，因为生产力还包括劳动者的体能、原料本身以及未经人类加工的天然劳动资料。与生产力相比，技术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存在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在技术不变甚至有所进步的情况下，由于环境污染或社会动荡等非技术因素，也存在生产力下降的可能性。此外，技术作用生产力的各种效应力度和形式受到特定社会结构和群体利益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生产力与技术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它们是一种复杂和交互的辩证包含关系，而且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技术元素，人们才能充分地增强对自然的探索、控制和改造能力。

然后，休斯指出技术生产力发展具有分离性结构，即存在生态破坏或生态良性方式的可能性选择。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判断新技术发展是否可能造成资源和能源的高耗费以及环境破坏，而在于这种消极的生态后果是否是所有形式的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换言之，对技术生产力生态向度解释核心不是其定量维度，而是定性维度即技术生产力发展的类型、性质和方向。总的观点是技术生产力发展是生态问题出现的充分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针对格伦德曼的第一个论断，休斯指出技术生产力发展确实增加了生态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但是生产力发展存在定性维度，它们可能提供更多有效的控制和探索自然的技术，这类技术将会减少生态破坏实际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现代社会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生产和生活对电力的依赖，人类已经不能离开强有力的新技术而继续生存和繁衍。当前的任务是认同新技术可能造成环境损害，同时探讨这种损害程度相比于已有技术是更严重还是有所减轻；对于洪水、地震、干旱、气象等自然灾害，要积极推动防灾减灾救灾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和新服务的发展。

休斯对于格伦德曼第二个论点的讨论是，首先，他夸大了新技术的风险系数，忽略了伴随新技术而生的精密控制和安全系统对风险的抵消效应，也没有考虑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可以更有效地增强新技术的安全系数，将危险发生概率控制到最低。其次，新技术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为更复杂和更紧密关联的特征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人类自身有权利和义务控制新技术朝着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的方向发展。针对罗特莉和科恩等人关于技术发展必然导致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的观点，休斯一方面肯定技术应用所造成的新的环境破坏与消除异化劳动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否定自动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源资源消耗的绝对增加。替代人的体力劳动的自动化，确实需要从自然界获取更多能量来替换原本的劳动力，从手工业生产转向机器大工业生产已经表明对自然能量的需求大幅增长；但置身于现代工业社会和全球人口总体扩张的时代背景，替代脑力劳动的自动化不仅进一步降低了人类劳动力占生产过程总体能量需求的比重，而且生产过程将在很大可能上以一种远比人为控制更加高效和节能的方式运行，因为高精密的自动化管理远比人类理性劳动要更加稳定、细致和“不知疲倦”。当然，单独依赖技术发展解决环境问题存在理论限制，因为人们难以保证技术手段可以达到何种水平，也难以保证新技术会及时被开发出来以避免可能的环境问题。

最后，休斯通过研讨技术发展的标准问题和生产力的革命性效应，进一步阐明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一，明确技术发展标准是判断不同类型技术生产力发展可能带来不同生态后果的必要前提。因为技术发展可以选择各种形式，指向不同的目标，从而可能带来截然相反的生态后果，所以首先要了解不同范围的目标是否可以被归纳入技术发展标准。根据休斯的介绍，史柯里莫斯基关于技术发展的三个主要特征，是新的种类的物品生产、现存种类的物品改善、降低生产（时间和金钱）成本，并将技术进步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对特定商品有效性的追求。休斯认为这个定义实际上掩盖了技术的复杂性：一是外部经济或生态问题的考虑被忽视了，二是物品本身属性和功能的多样化难以通过同一标准进行鉴定。贾维强调技术的社会特点，认为技术的精确性、持久性、有效性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总是由社会所设置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领域决定的。这里的困难在于“社会所设置的问题”难以界定，因为不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成员可

能会有不同标准或对标准给予有差别的重视。这样，不同因素可能在不同背景下作为技术的进步标准，并且被不同标准定义的技术发展将会带来不同方面的生态影响。其二，为了保障技术生产力顺利发挥革命性效应，马克思很可能会选择生态良性的发展形式。虽然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不足以构成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但是通过考虑生产力在其理论中的作用，可以辨别他支持或反对哪种技术类型。休斯认为，马克思通过生产力发展来解释生产关系变化从而引发社会形态转变，生产力在这里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就是为社会革命创造条件，因而将这种作用称为生产发展的革命性效应（the Revolutionary Effect）^{[4](P195)}。这个效应具有两个元素，分别是有可能创造新社会形态的促动效应和威胁现有社会形态存在的破坏效应。显然，技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破坏效应表明，不能将生态破坏性的技术发展形式归之于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不在于技术的比重，而在于技术受私有制规律的管辖，只能得到片面发展。技术生产力的应用与进步服从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需求，已成为一种伤害多数人和无限索取自然财富的力量。由于技术生产力发展具有促动效应，休斯认为马克思不会支持生态破坏性发展形式，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片面的”和“破坏的”批判，已经暗示了他倾向于增加人类普遍福利的技术选择；另一方面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马克思支持产出的无限增长，反而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消除异化劳动、降低劳动力负担和增加闲暇时间的前景，这意味着一旦满足社会全员的合理需要就应立即进入到技术生产力发展的稳定阶段。既然满足人类合理的多方面需要是共产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准或目标，那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将作为技术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功能，因为人类不仅客观上具有对适宜环境条件和闲暇时间的利益和需要，而且环境形势对人类的其他需要及其满足活动具备极大影响。因此，技术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良性形式可能被马克思假设为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

总之，技术在生产力体系中占据突出地位并且是第一推动力，技术生产力发展从概率学上确实会对人们所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影响，但重点在于并非所有的发展形式都会带来消极的生态后果。只有选择一种生态良性的形式，技术生产力才能发挥其消除异化劳动、减少生态影响的革命性效应。

三、共产主义：物质富足与按需分配的生态辩证法

在社会主义学说层面，一些西方环保主义者抵制马克思关于物质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正是要推动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来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及其观念的禁锢，从而创建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西方环保主义者看来，为了满足无限增长的需要而从事的生产活动，势必超出环境承载限度、破坏人类共同的生态家园，因而有必要限制需要的全面丰富和生产的无限增长。就劳动意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贪婪、暴力和破坏自然的，除非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加以改造”^[5]。共产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实现剩余价值的物质需要，二者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共产主义追求全面扩张的需要必然会加剧对自然界的侵占、掠夺和破坏。就劳动对象而言，单纯的自然产品和经过劳动改造的人工产品归根到底都来源于自然界，社会生产的无限增长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和能源动力，从而扰乱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就劳动资料而言，生产工具体现着人类对改造自然的迫切需求和征服欲望，而经过人类文明加工过的工具可能会越来越增加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索取与浪费。因而在许多环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因为它所宣称不断扩大人民的需要，发展生产以满足这些需要而受到批判”^{[4](P174)}。

生产创造并决定需要，需要是生产的原动力并构成其内在目的，它们的辩证法是贯穿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条主线。为了反击绿色批评者对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富足和按需分配原则的歪曲，休斯试图论证马克思是按照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来理解需要与生产力的，并认为它们将选择生态良性和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首先，就人类共同利益的层面而言，共产主义的富足程度取决于按需分配原则下人类真实需要的满足程度。在休斯看来，马克思正是以人类的利益和需要解释生产关系的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力发展。可以设想，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将促使技术生产力发展重新定向以有助于满足人类丰富的真实需要。他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认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富足将是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必要条件，并做出三点针对性总结。第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生产目的本身；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相对而言的概念，集体财富的源泉涌流到什么程度要根据现实的社会状况进行考量；第三，物质富足和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的基础，但需要的内容绝不限于单一物质方面，而是包罗万象，如对适宜环境条件与闲暇时间的需要。因此，人类真实需要的满足程度决定技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富足水平。虽然有人认为按需分配是将个人需要作为商品分配份额的配给标准，但休斯认为马克思更强调这一原则的物质前提，即只有每个人的需要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得到满足，才能坚持这种分配原则。

其次，为了考察人类需要对生产力定向发展的深刻影响，休斯对需要的三元结构进行理解、评价和改造，并试图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对该概念使用的一个框架”^{[4](P234)}。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在《人类需要理论》(1991)中提出“A为了Y需要X”的三元结构^{[6](P39)}，它意味着需要的满足及其程度必须经过一定的工具性中介或中间环节，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区分不同类别需要的方式，即可以按照它们需要的对象X或目标指向Y的种类和范围来划分。在休斯看来，三元结构的确可以适应所有需要(Needs)，但只能适应欲求(Wants)的某些部分，即主体的欲求只有部分可能获得满足。“需要是一个指向透明的语境，而欲求则是指涉不透明的。”^{[4](P233)}在二元结构中，需要X可以替换成其他内容而不改变对Y的针对性，但欲望Y本身就是模糊的，没有任何X可以锚定Y，甚至X某些时候就是Y。当X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被欲望的事物时，它的结构可以是“A为了Y欲求X”，即工具性欲求；当X是目的自身而被欲望的事物时，它的结构只能是“A欲求X”，即目的性欲求。因此，需要的三元结构只能适用于工具性欲求，它表明主体A相信X是Y的一种手段，而A不一定依赖X，因而X有可能是A不想要的东西；目的性欲求表明A需要X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信念，而是依赖于事实本身，因而是一种真值更高的需要。休斯将需要的三元结构改造成“A为了Y需要X”和“A欲求X”两种模式。这样，三元结构不仅支持需要和欲求经常相吻合的事实，而且能够通过涵盖相关目的Y中欲望满足的方式来阐明需要的概念，从而能够成为研究马克思需要和生产力概念的有益框架。

然后，休斯运用需要的三元结构考察了马克思对真假需要的区分，以论证他坚信人类需要应该得到扩大和满足，但不会支持需要的无限增长。马克思和绿色批判家们一致的观点是，人们自认的需要即虚假需要是无限增长的，满足这些需要无疑会导致生态不可持续。为了保障需要的满足是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目标，必须区分人的实际需要和自我认为的需要。一方面，资本主义诱发和操纵的虚假需要，具有独立于人之外和无限增长的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接近于承认现代绿色批评家所提出的自认需要与实际需要之间的区分，而且该文本中的“需要”指代被他人创造和操纵的欲望^①，很明显不同于按需分配所强调满足的需要；后来他在《资本论》中区分使用价值生产和资本扩张生产的异同，认为资本家们如果不想被自己的阶级抛弃就必须不断扩大

① 这里是指休斯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典语录：“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

再生产,而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环节,因而必须不断地转向他人身上塑造自我认为的需要来刺激商品消费。资本扩张生产的“需要”X就是目的Y本身,它不仅独立于主体A实际的需要和欲求之外,而且塑造了主体自认为拥有的需要,实际上要求主体的真正需要从属于资本“需要”,因而这是虚假和没有满足界限的需要,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生态后果。另一方面,主体客观上存在的真实需要,具有超越人的身体生存层次以及丰富和多方面的特征。通过比较作为工人的需要和作为人类的需要,马克思论述真实需要的核心要求是超越身体生存所必需的范围,坚信工人的需要应该扩大到全面的人的需要程度。他既认可资本主义创造了之前一切时代不曾具有的多方面需求与全面的能力体系,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公认的工人需要只能延伸到维系他们肉体生存、繁衍和履行工作职责的层面。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物质特征和意向结构,不仅使得劳动成为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唯一目的的活动,而且导致社会内部人同人相异化,从而降低了工人自我实现的能力。马克思倡导一种以“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形式,认为真正的需要包括对充裕物质财富、自由劳动和社会交往的利益追求。这表明他更关心人类真正需要的不断完善和扩大,而绿色批评家们更重视需要的适中和不断变化。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主张工人需要的丰富以及物质生产的永久性扩张,但实际上更加强调扬弃劳动与需要的异化。按照共产主义的逻辑,为了履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闲暇时间的承诺,人类需要及其满足活动在达成一定限度后就应该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因而不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生态后果。

更进一步,休斯通过将需要与生产的发展同人类繁荣紧密联系起来,论证了马克思非常关注人类需要的生态可持续性。如果把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连同对生产力发展的控制和改造,解释为符合人类利益和需要的东西,并且承认人类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利益,那么需要的增长就不会造成生态问题。其一,休斯将符合人本质的真实需要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马克思曾说:“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7](P514)}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是实现人的本性或满足人的需要的基本途径,并且通过这种活动,人与人联结成一个社会有机体。当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时,可以说是在实现自己的本性或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因而可以将这种真实需要称为自我实现需要。其二,为了达到人类的共同繁荣,他们通过创造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来满足自我实现需要。马克思不仅将生产活动置于需要的解释框架的核心位置,而且将其视为超历史的人类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8](P123-124)}人类社会器官的本质力量与生物器官的自然能力是一致的,但它们不是大自然赋予的最终形式,而是随着生产活动而不断变化和发展。显然,社会存在是确证人的本质和自然能力的必要条件,在社会的生产活动中探索和控制自然是发展这些能力的基本途径。人性的实现活动既要求培养和运用自己的创造性力量,又要求在生产中双重地肯定自己和另一个人,明确活动的价值取向是人类同胞的共同利益。这就显露出马克思关于人类的物种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最终目标。其三,马克思始终重视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态依赖原则,并且强调以生态良性形式确证和发展人的自然力量和本质力量。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满足吃喝住穿等一系列生理需要,因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他们生存和做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人类力量的行使是一个物质过程,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培养人的本质力量涉及使用和消费更多的物质对象,但是人类力量的发展同样表现在人类智慧及其对自然的利用和保护方面,因而以较低的环境成本维持或改善生产水平是可能的。人的需要具有同生产相似的分离性结构,自我实现活动可以选择生态良性或破坏性方式,但是个人活动的自由选择存在直接限制,即必须考虑人类整体需要满足的更一般因素。更确切地说,自我实现的活动不仅受制于一切人与人的合作形式,而且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并受到环境特征的影响。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生态制

约、合作限制与自我实现活动是相互兼容的，人类真实需要的满足不会产生有害的生态后果。

在休斯看来，马克思根据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来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富足和按需分配原则。根据这种理解方式，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区分真假需要，并要求把需要的丰富和完善调整至生态稀缺所要求的范围内；同时，他们强调为这些需要及其满足活动设定生态目标，即尽可能地实现人类的普遍繁荣，并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四、总结性分析与生态启示

综上所述，休斯的核心论点是对生产力发展做出定性解释，证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对环境问题及其制约因素的理解相一致，从而合理地阐发该理论的生态内涵。马克思关于人依赖自然并受其影响的解释方式，可以在宏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微观劳动过程概念中，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提供有益框架。根据这种解释方式，生产力发展不是单线或一维的过程，既不存在必须遵循的单一路径，也不存在衡量全部发展的单一指标，其共同特点在于以某种方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并促进人类的利益和需要。这些问题和利益会根据物质因素和社会条件以及不同阶级群体而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由于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生态良性形式将成为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

可见，休斯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生态学是相互兼容的，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独特理论价值。一方面，他在各个层面极为有力地捍卫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立场，而且拓展和丰富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哲学层面澄清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具有普遍性和生态依赖性，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哲学及其思维方式是相互兼容的。马克思在诸多著作中表明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以及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休斯将这些观点简化为生态依赖的解释方式或原则，并将其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这有助于更方便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相容关系。其次，他在政治经济学层面驳斥西方绿色批评者将生产力理论简单歪曲为技术决定论，从定性维度阐明了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良性形式同消除异化劳动、改善生态质量具有内在一致性。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革命性效应的理论，他主张生产力发展应该在分离式结构中选择生态良性形式，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态生产力的要求。最后，他在社会主义学说层面纠正西方环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误解，从人类繁荣的角度阐发共产主义物质富足与按需分配原则同适宜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揭示人类需要的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而且阐述生态危机背景下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增添了生态制约、合作制约、自我实现的满足活动等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休斯有力的生态辩护具有四个鲜明的理论特点，为我们批判西方各种错误思潮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始终厚植于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如坚持概念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相统一，从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期《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发掘劳动过程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以及受到自然特征影响的永恒性。二是始终依据马克思讨论问题的具体语境，如论述按需分配与物质富足的关系时，强调马克思不仅要求将需要作为配给份额，而且更加关注实行这种分配原则的物质前提，否则只会导致普遍贫穷。三是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研究者的解读和绿色批评者的观点评述串联起来，如认为格伦德曼等人之所以会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将科恩对马克思理论的偏颇认知当作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从而错误地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处理生态问题上没有区别。四是解读和辩护用词极为严谨，如对马克思在文本中确实没有做出的判断，多次使用“似乎”“可信”“暗示”等推测性词汇发掘其可能存在的生态意蕴，而对马克思明确表态的论点，使用“坚信”“有理由”等肯定性词汇澄清事实真情。这两类词汇的严谨使用充分展现了生态辩护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从理论缺憾上看,休斯在维护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成分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偏颇。其一,他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唯物辩证法,转向分析马克思主义,从而没有完全坚持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解释方式,只是围绕生态依赖原则进行单向阐述,实际上没能充分展现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意蕴,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面对西方绿色批评者利用马克思主义文本做出机械与还原性的生态责难,休斯试图在文本考察的基础上仔细地捍卫每一个论点,因而采取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的功能分析法,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生态向度的功能解读。显然,在细节上的过度谨慎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辩证法,但这种分析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方法远远不能全面地展现人与自然因果互动的双向关系。休斯试图通过功能分析法来修正和补充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其二,他没有突出理论学说的政治导向功能,淡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实际上反映了他淡薄的阶级意识和模糊的阶级立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者,休斯对于表达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极为笼统,甚少触碰消除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政策主张;同时,有意将理论批判与实践革命分割开来,没有提出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主张,只是简单比较了共产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究其原因,他始终生活在资本主义极为发达的英国,并且已经成为社会中产阶级,自身难以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彻底的阶级立场;同时,他始终将化解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良性形式,一开始就没有考虑改变阶级和制度的革命性方案。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发展理念和利益诉求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放弃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当休斯一味强调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良性形式时,实际上在掩盖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全部责任。其三,他脱离生产关系来谈论生产力,没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良性形式所必须依托的生产关系或社会结构做出足够回应,实际上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西方绿色批评者攻击的重要对象。特殊的生产主要是由特殊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格伦德曼、罗特莉和科恩等人在论证技术生产力必然导致环境破坏时,严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对此,休斯只是把技术生产力的定性维度局限于生态良性与生态破坏的结构选择,完全忽视了生产力运行必须依托的生产关系,只是较为敷衍地论述社会结构可能会影响技术发展的轨迹。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力发展的唯一目的是攫取无限的剩余价值,生态危机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造成的;也没有看到,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合理分配的社会结构,人类才能真正克服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生产力发展才能真正地选择生态良性形式。其四,他运用需要的三元结构来分析需要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特别是夸大需要对生产力性质和方向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是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以需要的三元结构为研究框架,休斯认为需要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进而主张通过发展真实需要、反对虚假需要来引导生产力走向生态良性的发展道路,从而解决生态危机。但是这种主张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的三元结构不能解释需要的本质和满足的特性,也无法判断需要的真值程度,尤其是马克思从来没有用三元结构来分析需要概念。事实上,需要的三元结构只能从心理学层面简单说明需要的逻辑表达形式。其次,人的需要和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取向,但是它们不可能完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走向。在需要与生产的辩证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而非人的需要或消费;同时,需要和生产力毕竟是两个不同对象,人的行为动机不能等同于活动的决定性。最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区分真实需要与自认为需要,是非常困难的。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普遍衡量需要真值或满足程度的客观标准,依然是一个十分争议的问题。即使存在这样一个客观标准,个人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区分真假需要或选择不同的满足状态,也是一个非常主观而难以测度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人的大部分需要是以商品消费为中介来

表达和满足的，这进一步增加了需要的本质与满足来源之间的模糊性。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休斯的理论辩护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和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绿色启示。其一，要促进思维方式的绿色化，运用生态系统思维去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休斯认为，人与自然在因果关系上是双向互动的，但人对自然的依赖是单向的事情，因而生态依赖原则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这种原则要求人将物的尺度包含在自己的尺度中，形成生态系统的思维方式。“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9](P56)}实现思维方式的绿色化，要从生态系统的思维角度去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将人作为自然界的内在有机部分，实施多要素综合统筹管理，力求保障自然界的原生性、系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另一方面要关注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特殊性，关照各生态要素与子系统的具体情况，多维度、多尺度、多层次地有序推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其二，要实现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休斯坚持辩证发展观，既承认现代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增加了能源资源的高耗费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的可能性，又认为生产力发展具有分离式结构，可以选择生态良性形式来有效避免这些消极的生态后果。这实际上要求发展生态生产力，将绿色原则贯穿到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各个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9](P19)}在促进产业结构绿色化方面，既要采用先进的节能科技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努力化解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又要推进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尤其要优化能源结构，加强传统能源的绿色开发和低碳利用，推广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方面，既要推动经济增长从规模扩张到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又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特别是要促进生产与生活系统的循环组合，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和能源利用体系。其三，要推动科学技术绿色创新，为建设美丽宜居的生态家园提供更多技术支撑。休斯驳斥西方思潮关于生态危机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谬论，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更多有效控制和探索自然的手段，在缓解人口压力、节约能源与资源、防震减灾等领域极具发展潜能。这实际上要求科学技术要树立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开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迫切要把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当前的任务在于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领域推动关键技术攻关克难，比如，积极创新人口优生优育技术，重视人口生态学、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的健康发展，为完善人口政策提供科学理论的支撑；大力发展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科技，注重能源资源的高效、节约和循环利用，加快建立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体系；重视发展防震减灾救灾科技，全面提高针对洪涝、干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科学预测和技术防范能力等。其四，要积极促进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化，尽可能降低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休斯强调人类自认为的虚假需要，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真实需要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包括人对环境条件的需要和利益，不会产生有害的生态后果。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须承认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之间的差异，以便通过限制欲望满足的范围来应对生态匮乏。这种观点为实施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要倡导节约消费，反对奢侈与浪费，将消费水平限制在地球生态阈值允许的范围内；强调清洁消费，选择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和休闲模式；重视低碳消费，降低生活和消费的碳依赖；关注循环消费，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对工人需要的“节约”命令，社会主义消费方式的节约原则是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观念与行为，逐步形成文明的节约型消费模式^{[10](P170-171)}。总之，推行绿色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既要关照生态系统的平衡阈值和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又要不断提升人的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从生活和消费的角度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参考文献

- [1] Benton, T.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J]. *New Left Review*, 1989(6).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Reiner, G. *Marxism and Ecolog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4] [英]乔纳森·休斯.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5] Lee, D. C. On the Marxia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0(1).
- [6] Doyal, L., I. Gough. *A Theory of Human Need*[M]. Basingstok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1.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8]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On Jonathan Hughes' Ecological Defense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HU Yun-hao

Abstract: As a famous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Marxist, Jonathan Hughes firmly opposes the western green critics' ecological accusations against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 and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theory is compatibl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ir restricting factors. He us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clarify the universality and ecological dependence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process in the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dhering to the main viewpoint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he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volutionary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needs to be realized in the form of ecological benign in the study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ll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he shows Marx's socialist form characterized by ecological constraints,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needs enrichment i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need for ternary structur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theoretical shortcomings in this defense, such as absence of dialectics, lack of political guidance, contempt for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xaggeration of the role of needs, it still provides green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inking mode, production mod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 mode.

Key words: Marx; Hughes;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Marxism

(责任编辑 孙 洁)